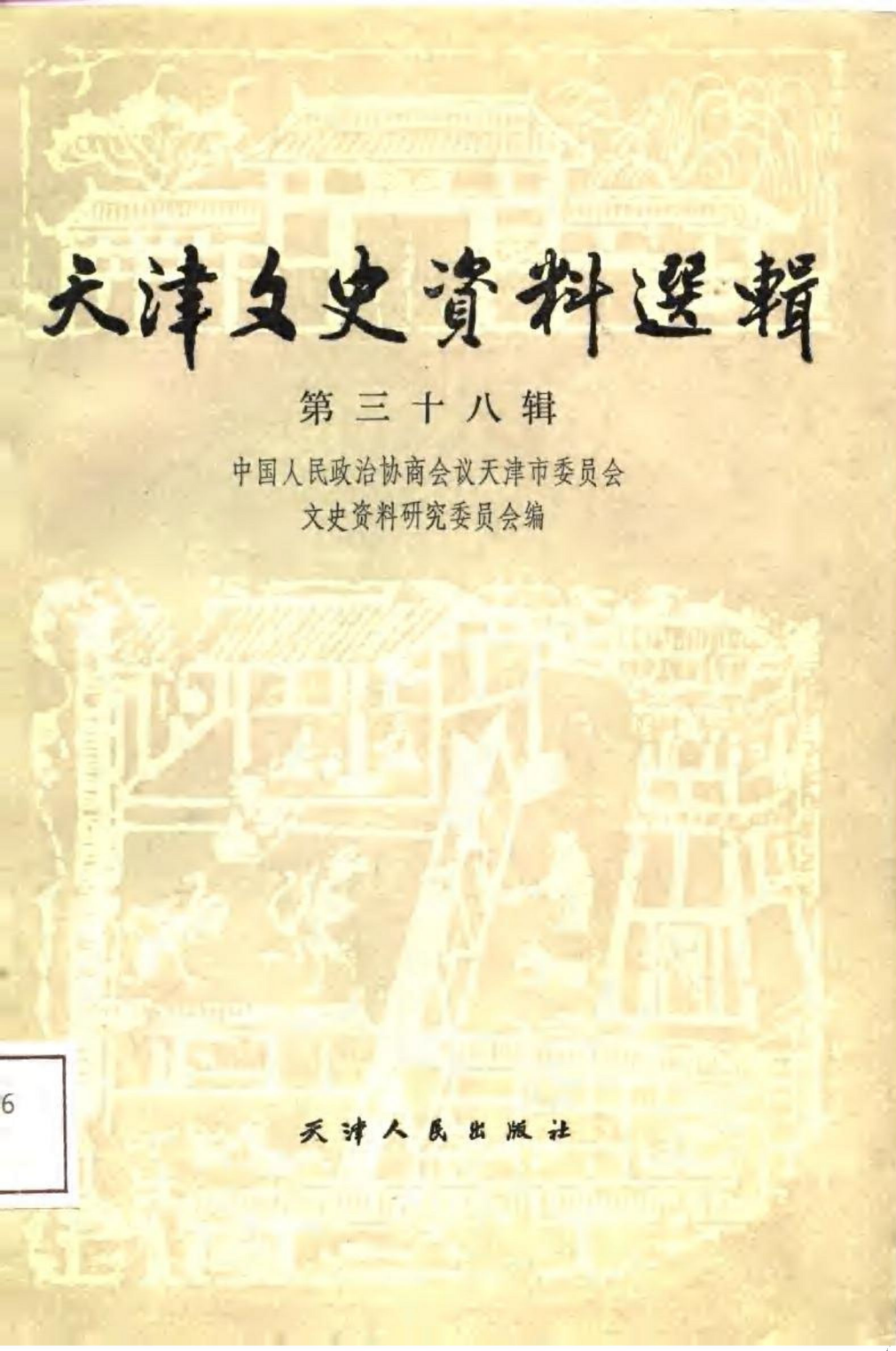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large, faint, golden-yellow illustration. It depicts a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al complex, possibly a temple or government building, with multiple halls and a central tower.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figures of people, some standing and some in motion, suggesting a historical scene. The entire illustration is rendered in a style that blends with the aged, textured paper of the book.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十八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十八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一月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4插页158千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11072·201

定 价：1.35元

目 录

忆念周叔弢先生·····	乔维熊 (1)
周学熙的一生及其所办企业·····	周禹良 (43)
天津华新纺织公司始末·····	周学辉 马镜轩 (67)
周氏师古堂创办始末·····	周慰曾 (78)
自传·····	李霁野 (81)
记两次逃亡·····	李霁野 (90)
天津近代教育家陈宝泉先生·····	朱经畬 (96)
陈星彩先生办学事略·····	陈东生 (111)
严范孙与崇化学会·····	刘炎臣 (113)
蒋经国从政的三大支柱·····	许功锐 (118)
我和蒋经国的一段往来·····	曹钟麟 (146)
马大夫纪念医院简史·····	张维华 (149)
天津水阁医院·····	徐亚伦 (153)
天津德美医院·····	李步峰 (158)
田大文与天津防盲医院·····	田乃中 (166)
天津结核病院的创建经过·····	杨肖彭 (171)

天津十年.....许姬传 (174)

补
白

唐山华新纱厂与日本人合办经过.....张麟标 (66)

回忆河北女师外语系.....孟昭蕙 (89)

蒋经国在赣南轶闻.....吴次然 (148)

周叔弢藏书点滴.....翟璐 (226)

怀念周叔弢先生

乔 维 熊

一、我们的交往

爱国老人周叔弢先生逝世已经两年多了。回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认识周叔老以来，交往近四十年。叔老的音容风貌，迄今仍历历如在眼前。

我与叔老的结识，还有一段缘由。那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我的母校北平燕京大学被侵华日军宪兵队封闭，一些爱国师生被捕，其中就有教授陆志韦、洪煨莲、邓之诚、赵紫宸、林嘉通、蔡一谔、赵承信、刘豁轩、侯仁之诸人。后来陆志韦、洪煨莲先生等陆续被释放，但不准许他们离开北平。多数人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困境。而更有胜于物质生活贫困的，则是精神上的重压与痛苦。于是，一些留在北平的燕大师生时常聚会在洪煨莲教授家中，传递抗战消息，谈论国际形势，讨论燕京大学的前途和将来应当走的道路等等问题。当时，洪煨莲教授的住宅形成了部分爱国师生活动的中心，大家都盼望着抗战的胜利，盼望着燕京大学复校，而且希望将来能够从美国教会手中收回燕大，由中国人自己来办，并计划联络天津实业界有识之士，请他们提供办学的经费，燕大则将品学

兼优的毕业生输送给天津工商界。这个想法通过当时在天津工商学院和达仁商学院任教的侯仁之教授，与天津寿丰面粉公司经理孙冰如先生多次商量，并逐步联络了天津一些实业界的知名人士，希望得到他们的赞助。这时正担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的周叔弢先生就是一位热心的赞助者。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复校，我们这些被迫离开了燕大的爱国师生又返回了母校。但是，当时的形势，由中国人自办燕大的计划已是水月镜花，成为泡影。爱国师生们却仍为之奋斗，终于在一九四六年成立了燕京大学工学院，天津的民族企业家李烛尘、周叔弢、孙冰如等给予了部分资助。从此，天津工商界与燕京大学有了联系。

一九四六年夏，我应天津孙冰如先生之聘，担任了天津寿丰面粉公司职工福利科主任，因而开始与天津工商界人士有了来往，得以结识素所敬仰的周叔弢先生。

当时，天津工商界有个名叫“三五俱乐部”的组织，前身为“甲戌俱乐部”，参加者都是天津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一般中、小企业主是不能涉足这个俱乐部的。俱乐部每逢周三、周五开放，会员们可以来此品茶、聊天，也可以聚餐，吃到特聘名厨烹调的中西名菜佳膳。素常前往三五俱乐部的，有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烛尘，中国纺织公司总经理杨亦周、副总经理王瑞基、卢统之，东亚企业公司总经理宋棐卿、副理陈锡三，仁立实业公司总经理朱继圣，华新纱厂经理劳笃文，永明油漆厂经理陈调甫，恒源纱厂经理边洁清，北洋纱厂经理朱梦苏，辅中公司经理谭志清，华北制革公司经理王晋生，天津造胰公司经理何宗谦，以及银行界的知名人士资耀华、李钟楚、杨天受和商界头面人物毕鸣岐诸先生，周叔弢先生也经常到俱乐部

参加一些活动。我就是在三五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上，经孙冰如先生的介绍，得以认识周叔老。因为燕京大学部分爱国师生在抗战期间与天津工商界有过联系，拟议自办燕京大学的事得到过周叔老在内的天津实业家的支持，加之周叔老的子女中，如周一良、周杲良等均毕业于燕京大学，因此，我们交谈甚为欢洽。周叔老给我的最初印象是谈吐温文尔雅，文质彬彬，衣履朴素，不尚浮华。当时听说，先生唯读书、买书、藏书是所嗜好，他到三五俱乐部主要是与李烛老、孙冰老等知交聚谈。谈到实业，他那种志在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爱国热情，溢于言表；谈古籍金石、特别是谈善本书，反映出他的学识渊博，见识过人。那时，我与叔弢先生接触不多，仅凭这些粗浅的印象，我已感到他是位博学、正派、有修养的饱学之士，又是一位精干的富于爱国心的民族实业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挑起内战，到一九四八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北、中原各战场都被打的落花流水，面临全面崩溃之势。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政府迫令天津的工厂企业迅速南迁，象永利、久大、东亚、仁立、寿丰和启新这样一些大型企业都被列在南迁的名单之内。南迁，震动了天津的工商界，许多工商业者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到三五俱乐部的人反而增多了，他们表面上还是吃喝聊天，实际上都在打听战争消息，交换对形势的看法，并从中探听同行业之间应付时局和南迁的办法，尤其是李烛尘、周叔弢、孙冰如诸先生的动向。当时，天津工商界多数人在观望，也有少数人抽出资金，准备南逃。

三五俱乐部一向是标榜“超政治”的娱乐场所，虽然不象一般茶楼酒馆那样张贴着“莫谈国事”的告白，但谁也不愿在

那里公开谈论政治形势。可是当“南迁”与“反南迁”斗争展开的时候，李烛尘先生带头把要不要遵照国民党政府南迁命令的问题，拿到三五俱乐部的聚会上来议论。看得出来，李烛老反对南迁的态度非常坚决，周叔老、孙冰老的态度与烛老完全一致。不过，在白色恐怖之下，他们不可能公开表明“反南迁”，而是提出一连串实际问题，令人思考。如提出：永利、久大、启新这样一些大型重工业工厂，迁到哪里？如何迁法？数以千计的职工如何安置？激起工潮，谁人负责？等等。这些实际问题的提出和议论，实际上是对国民党政府有关南迁命令的质疑。其实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处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困境，根本无心也没有力量解决南迁的各种具体问题。于是，三五俱乐部的一些工商界代表人士即以向国民党政府要办法为理由，拖延时日，抵制南迁。

但是，这些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顾虑很多：不跟国民党政府走，留在天津，解放后的命运到底怎么样？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自然要包括城市资本家，是敌是友？何去何从？表面镇静，实际忧心忡忡，进退维谷。要消除工商界人士的顾虑，稳定他们的情绪，迎接革命的胜利到来，需要有人出来正确地开导。通过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帮助，李烛尘先生带头，在三五俱乐部和其他适当的场合，宣传解释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工商业者的政策。当时，在三五俱乐部的成员中，无须驳斥什么共产党乃“洪水猛兽”、“共产共妻”之类的谰言邪说，因为这些工商业者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多多少少具有一些社会科学常识，不会轻信那些反动宣传，而急需知道的则是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李烛老不顾个人安危，义不容辞地站出来说话，周叔老与李烛老私交最好，意气相投，并且都与党的地下工作

者有联系，于是他们言行一致，站在拥护革命的一边，在当时影响很大。

疾风知劲草。我对于李烛老、周叔老的爱国之心和胆识，十分钦佩。抗日战争时期，李烛老身居重庆，与中共方面的领导人多有接触，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周叔老留居沦陷了的天津，为避免敌伪的纠缠，深居简出，洁身自爱，党的地下工作者通过各种渠道做叔老的工作，而周氏子侄中的进步青年人，也向叔老传递一些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物，讲述一些解放区的情况，叔老诚恳接受，秘密阅读。因此，在天津的工商企业家中，他是阅读《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诸种“禁书”最早的人之一。叔老接受书中真理，对照自己数十年的生活实践，不能不寄民族复兴、国家兴旺的希望于一个新的政权、新的国家的诞生。当时作为生活在旧中国的资产阶级中的一员，能有这样的表现，确实令人赞佩。后来，叔老和我们回顾这一段生活，总是谦逊地说，那时候，都是李烛老带头。其实，叔老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解放后，周叔老担任天津市副市长，他参加政治活动大为增加，我和他往来不多。后来，我被调到市工商联担任副秘书长，叔老参加天津工商业联合会直属组学习，互相接触多了。

“四人帮”垮台后，政协恢复活动，我担任了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叔老出任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委，我们来往逐渐频繁，叔老和我谈时事，谈政治，谈历史，也谈古籍，谈诗文，更多的是谈有关政协和工商联的活动，非常欢洽。他常以周恩来总理的遗训“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自勉，也勉励我。叔老的爱国热情、崇高品德和务实精神，使我深受教诲，永树风范。

周叔老生前，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曾与之谈妥，将叔老的一生经历纪录下来，作为史料留存。工作刚进行不久，叔老即因病住院而中断，至为憾事。我有幸参与这一工作，亲聆叔老忆述往事；又，一九八三年东至县曾派人来津，为编撰地方志向叔老征集有关史料，叔老命我陪他接待，亦得以了解周氏家族的一些情况。兹回忆记述如下：

二、周氏家世

周叔弢先生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七年）七月出生于江苏扬州。周氏原籍安徽省建德县（今东至县）。当年，全国有三个建德县，安徽建德一度更名秋浦，叔弢先生早年即以秋浦为别号，花甲以后，则以弢翁为号。

据周氏家谱及有关史料所记，秋浦周氏祖居徽州婺源（今划入江西），大约是在唐高宗时，为避武氏乱，始迁建德。叔弢先生的六世祖周繇，咸通进士，有文名，与许裳、郑谷等被时人誉为“咸通十哲”，并有“诗禅”之谓，我国文坛上的“池州文学”就是从他们这个时候兴起来的。而自周繇之后，五世祖文元、四世祖礼俗，高祖乐鸣、曾祖光德，则夙守耕读，从事农商，在家族中已没有仕官显宦，一直传到叔弢先生的祖父周玉山，才又重踏宦途。

周玉山，名馥，字兰溪，奋迹畎亩，起于寒素，清朝中末期，入李鸿章戎幕，后来官至两江（江苏、浙江）两广（广东、广西）总督，位列封疆，清史有传。清末民初，周馥优游林下，寓居天津杨桥旧庐，以读书、撰文娱怀遣日，终年八十五岁。时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清王朝覆亡已十载，而

末代皇帝溥仪之小朝廷尚在活动，对周馥之薨还下了一道谕旨，予谥“愬慎”。后来，周家刻印周馥的文集使用谥号，名为《周愬慎公全集》。

周馥有六子、三女，叔弢先生的父亲周学海，昆季中居长，二叔学铭，三叔学涵，四叔学熙，七叔学渊，九叔学辉。昆季六人，生活在清代封建王朝，官宦家庭，视科举为正途，都是幼习举业。除学涵早卒外，其余五位都于光绪年间，先后取掇巍科，步入仕途。叔弢先生的三位姑母，长适庐江刘述之，次早丧，三姑瑞珠，适袁克轸（夙鏊），为袁世凯第八子媳。

叔弢先生的四叔周学熙，致力北洋新政，民国初年，两次出任财政总长，创办直隶工业局、银元局、官银号、中国实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启新洋灰、滦州煤矿、华新纺织、耀华玻璃等公司，被尊为“北方实业巨头”，与江南著名实业家张謇相并提，有“南张北周”之谓。周氏这个官宦之家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周学熙是关键人物。

周氏祖辈原籍安徽，定居建德，而自周馥步入宦途之后，先后旅居青岛、天津、北京。至于周学海这一支，迁居扬州，则是在叔老降生前的事情。据周馥自撰年谱所记：周学海系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乙酉拔贡，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戊子中举，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壬辰进士及第，殿试得三甲第十九名，连掇高科，以内阁中书用，俸满裁取同知，分发河南，署在清江。后因周馥以为“家事艰难，生齿日繁，不欲其远仕，亦不欲其宦京，命往扬州经理生业”，于是叔弢先生的父亲就遵命以江苏候补道员的身份，定居扬州。当时，周家在江苏泰兴经理盐运，领有盐运使衔，在泰兴县设泰

合成盐号，包运海盐及门市批售，主要经理人则是周氏的一门姻亲。由于周学海定居扬州，叔弢先生便在这座风物旖丽的古城诞生，并且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一年，度过了少年时代。

叔老直到年逾九十的时候，回忆在扬州的儿时往事，还总是一往情深地说“记忆犹新”。他在扬州降生的旧居，被称做“老屋”的宅邸，原是极普通的一座民房，只是照壁不在门楼之内，而是象北京的许多民房那样，矗立在门楼的对面。这样布局的建筑，在江南江北一带，好象只有庙宇、官衙采用这种形式，因此，亲朋戚友中多有议论其“风水”的。叔老少年时代，一直是在“老屋”里过着极为朴素的生活。周学海体弱多病，对于仕途经济都较淡漠，少交游，唯好读书，尤喜钻研医学，通医道，能给人按脉、处方，进而着手著述，编撰《周氏医学丛书》，对于中国传统的脉学、药学等，作了很多的记述，时人认为这是一部有利于后学的医学专著。在“老屋”里，周学海有一间狭小、简陋的书房，有一些藏书，他自己就终年在那里读书、著述。叔老儿时，轻易不敢到父亲的书房里去，但父亲好读书的性格，却对叔弢先生个人以及在扬州的整个旧家都有较深的影响。

光绪三十二年周学海病故，终年五十一岁。周学海膝下有五子、五女，叔弢先生齿居第三，故名叔弢，又名明暹。先生的长兄名明达，字美权，精数学，后来集华邮，有“华邮收藏家”之名。次兄明逵，字仲衡，从事西医，精于外科，解放前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四弟明进，字季木，号楠，长于簿录之学，在他的北京住所书斋“居贞草堂”中，吉金乐石，盈架累屋，珍藏汉魏晋珍贵金石，解放后捐赠故宫博物院。五弟明运，字元和，号五祥，曾经营银钱业。周学海身后，将存

款分为六份，一份为夫人的赡养，其余分在兄弟五人名下，每人五万元。叔老回忆：当时自己年方弱冠，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有了巨款，怎么花呢？在那个社会里，有的人手头有了钱，吃喝玩乐；有的将本求利，做“陶朱公”。而他有了这笔钱，首先想到的是要买些书。他在没有独立的经济以前，不敢买书，也买不起书。年轻的叔弢先生，喜逛书店，常到扬州辕门桥的三家书店去看书，但一元钱以上的书，就不敢问津，只是买上几本石印的廉价书。有了独立的经济，买书可以自主，买书嗜好也养成。先生回忆：周学海对于孩子们看闲书，不管也不知道；家中有塾师，叔弢先生在做完塾师规定的功课，就自己看闲书。周学海还敦聘西席，教授英文。叔弢先生说自己那时候是“胡乱读书”，学英文的时间也不长。可是，我则以为先生在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对先生性格的形成，思想境界的开拓，广博知识的积累，都是有帮助的。他的英文水平能够笔译，也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周学海病故以后，叔弢先生伴随太夫人又在扬州生活了三年。一九一〇年，当他十九岁时，太夫人弃养。是继续留居扬州呢？还是开拓新的生活道路呢？虽然这时候先生尚未结婚，没有家室负担，但对前途不能不有所考虑。如果留在扬州，继承周家的“生业”，那就是经营盐业。泰合成盐号，在江北有一定名望，是周家独资经营的，凭票运盐，按制养有兵丁，运销海盐，有一套传统的经营方式。年轻的叔弢先生，对这种亦官亦商的生业很不感兴趣。于是在办完太夫人的丧事守制以后，他就离开了生活了二十一年的古城扬州。在此前后，弟兄们也离开了旧家，各奔东西，“老屋”人去楼空，扬州旧家不复存在。

三、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英年有为的周叔弢先生，对未来怀着美好的憧憬离开了家乡扬州。先赴上海，随后移居天津，一九一九年到青岛，随他的叔父周学熙经营实业，任职于青岛华新纱厂，为常务董事。一九二五年到唐山，任唐山华新纱厂董事兼经理，同时兼天津华新纱厂经理。此后，又在滦州矿务、启新洋灰、耀华玻璃等公司任职。他怀着强烈的事业心，努力筹划经营这些企业，谋求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在北方实业界，他的作用与名望甚高。但是直到八十年代，他年逾九十的时候，谈及这一漫长的经历，他还总是谦逊地说自己“不是创业者”，而把华新、启新这些华北重要企业的创建、经营之功，归于周学熙和其他一些人。

叔老经营工商数十年，花费心血最多的首推华新与启新两大企业。华新厂属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最先创建的是青岛华新纱厂和唐山华新纱厂。华新原有“五厂之议”，计划在青岛、唐山、天津、卫辉、济南各办一个厂，并拟把济南厂办成“模范厂”。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反映了周学熙等北方实业家创建民族工业的雄心大志。创建实业有个曲折和艰难的过程，青岛华新纱厂的创建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据叔弢先生的堂妹周叔贞撰文所记：早年有一德国人在青岛的沧口地方办了一座缫丝厂，因经营不利而停办，留有厂房、机器。周馥退隐之后，寓居青岛，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周学熙离开民国财政总长之任，也到了青岛。周馥偕周学熙察看缫丝厂旧址，认为可以利用它兴办工厂，遂将其购下，改建

棉纺厂，向德商瑞记洋行订购了英国爱色利斯厂纱机五千锭。纱机未到而欧战起，日军占青岛，英商和记洋行强占缫丝厂旧址。后来，几经交涉，才得收回。另据周实之先生生前忆述，周学熙鉴于官方投资兴办工厂企业易受时局、战争等政治因素的牵制，青岛华新纱厂始建之时，既没有官方资金，也没有用商办兴华资本团的资金，而是由周学熙发起，在周氏家门内集资。周氏各房男女长幼都拿出“私房钱”认购股票，每股十元、十五元不等。叔弢先生认购股票十万元。一九一九年，叔弢先生离开天津赴青岛，任青岛华新厂常务董事，参与经营管理，这是他步入实业界之始。

青岛华新纱厂开工后的头一、两年，生产和经营情况都比较好，股东几乎“清一色”都是周氏一门的亲眷。大家信托于周学熙，却不干预厂里的事情，经理、董事之间易于统一意见，办事无多掣肘，便于管理，生产效率也逐步提高，所出棉纱质量较高。当时，竞争十分激烈，首先是日商利用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在青岛大办纱厂。当华新纱厂筹建时，青岛还没有纺纱工业，可是就在华新厂交涉厂址期间，日商内山棉纺厂先于华新建成开工，成为青岛的第一家纺纱厂。这时“一比一”的竞争还不算尖锐，及至大康、隆兴、公大、富士、宝来五家日商厂先后建成投产，华新就处于“一对六”的境地。随后又有丰田等厂建成开工，华新更处在日本纱厂的包围之中，竞争激烈而艰苦。周学熙为华新指授方略，正副经理裴伯航、吴伯僧和周学熙之子周志俊主厂务。随后，周志俊受父命赴欧美考察纺织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周叔弢与裴、吴诸经理主事青厂，他的谦虚谨慎、办事认真和卓越才干，都得到上辈企业家的器重。当华新卫辉厂兴建后，该厂的主要负责人、

华北知名的企业家王筱汀，恳邀周叔弢到卫辉主事于新厂。这样，周叔弢先生离开青岛，前往卫辉。

青岛华新纱厂在竞争激烈、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以周氏为主力，全厂职工尽心合作，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诸方面，出奇制胜，扩建织布、染色、印花车间，使之成为工序完整的纺、织、印、染工厂。这样的全能厂，是为当时国内纺织工业中的佼佼者。这就既为日商所忌，也为日本侵华势力所不容。日商妄图以强压弱，多次提出要收购青岛华新纺织印染厂，遭到厂方断然拒绝。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多番逼购，华新厂上下同心，坚持斗争，力拒强敌，一直到“七·七”事变以后，日军登陆，日商宝来纱厂强迫购买该厂，华新厂职工同舟共济，及时转移沪上，由周志俊为经理，开办信和纱厂，惨淡经营。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一年多反复交涉，终将青岛华新厂收回，以上海信和纱厂之人力物力复员青岛，青岛华新纺织印染厂得以恢复。叔老生前强调自己没有经历华新纺织厂创建中所经忧患的全过程，但也由此，使他深知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前辈创办实业的艰难，同时也使他对民族资本的发展和局限，有了初步认识。后来，他终于能够认识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救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

卫辉华新纱厂是与唐山华新纱厂同时筹建的。这两个厂的资本都是由兴华资本团筹付。筹建时间，纱锭定额，建厂规模等完全相同，堪称一对“孪生兄弟”。卫厂位于河南的卫辉府（今汲县），兴华资本团的首脑王筱汀等都是卫辉人士，他们鉴于家乡地瘠民贫，想开办纱厂以利乡梓，同时因河南为产棉区，办纱厂可就近收购原棉，还可以采取“以工代赈”的途径，取得廉价的劳动力，有利可图。于是，在津筹集资金时，